

中国军事史

第二卷 兵略（上）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编

王蜀生 王腾达 方人熙 田昭林
石声璧 白太常 陈西进 何少桓
邵 青 赵古松 赵秀昆 郭汝瑰 执笔
陶文焕 曹月轩

董 珍 审校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中国军事史

第二卷 兵略（上）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编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19 $\frac{5}{8}$ 印张·53万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85·43 定价：5.20元

內 容 提 要

本卷从我国几千年的各类战争中，选编三十三个专题，论述了我国历代战争的战略问题。侧重探讨的是具有关键性战争的战略方针、战略措施及重要的战役指导、战役布势等问题，并简述了历代战略的特点及发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本卷分上、下两册出版。上册论述先秦至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下册论述隋唐至清末时期的战争。

说 明

我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以及国内各民族、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数以千计，其中许多关键性的战争，往往决定或影响某阶段历史的演进和某些民族、王朝的兴亡盛衰。指导这些战争的统帅人物及谋臣名将的谋略决策，给我们留下了极丰富的宝贵经验及教训。虽然时过境迁，这些经验教训已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但我们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则在一般战争指导规律上，仍有许多可借鉴之点。这就是我们编写本卷的目的。

本卷共选编三十三个专题，分上、下册出版（上册十七个专题，下册十六个专题）。在选编时，虽然曾企图使读者通过本卷对我国古代战争的发展有个粗线条的了解，但本卷的任务毕竟不是探讨战争发展的历史，而是研究历代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没有过多地照顾历史的连贯性。对在战略上无重大研究价值的战争战役亦不涉及。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经济实力的角逐，是不同素质人们的较量。因此，为了从战略高度来探讨战争的前因后果及胜败原因，对与战略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

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等情况，作了必要的叙述。

本卷既然以论述战略问题为主，因此侧重探讨的是具有关键性战争的战略方针、战略措施及重要的战役指导、战役布势等问题。每一专题的篇章结构及长短，根据战争规模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等，“量体裁衣”，不求一律。

为了不失古人原意，对一些与战略问题有关的、具有判断结论及决策性质的原文，基本上全文引用，以作为立论的根据；次要的原话，摘录要点；难懂的古文，在后面括号内作简要注释或全部译为现代语言，注明出处。

本卷使用了一些现代军事术语，如战略方针，战役布势，内线、外线作战以及敌情判断等……实际上古代并无此类军语。这样作主要是为了使读者更便于理解古代战争。但为了避免以今比古，强加于古人，我们对古人的谋略决策，尽量保持古人用语原貌，防止古人说现代话，只在表达作者意见时，才谨慎地使用现代军语。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作战经过，每一专题均插有若干示意图。以虚线及实线标号来区分作战双方的部署和行动。古代方阵战斗队形为今日军队标号所无者，以适当标号代替。

本卷是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集体研究、编修、定稿的。

因系分章定人撰写，为尊重执笔人的意见，书中有些看法，并非全组一致意见。上册执笔人为：第一篇综述田昭林，第一、二章石声璧，第三章郭汝瑰、陈西进，第四章赵古松，第五章何少桓、曹月轩，第六章白太常、赵秀昆，第七章方人熙、陶文焕，第八、九章王腾达、王蜀生，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及第二篇综述王蜀生，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邵青、陶文焕，第三篇综述陶文焕。全卷由王蜀生统一文字、体例并根据集体研究的意见，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删，最后由董珍审校。

本卷是在总参军训部和成都军区的指导下编写的。编写过程中，军事科学院曾提供部分资料；南京政治学校、解放军出版社在工作及生活上大力支持，多方照顾；重庆北碚人武部杨先孝同志在财会工作上积极帮助，使我们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在此深致敬意及感谢。

王蜀生同志为此书工作到最后的一息，编写组全体同志对他深表敬意！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不足，特别是我们的水平有限，分析和论述不够周全，议论偏颇或其他缺点错误势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及专家提出批评和意见。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目 录

第一篇 先秦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1)
第一章 商汤灭夏	(3)
第二章 武王灭商	(14)
第三章 春秋争霸	(36)
第四章 战国兼并	(89)
先秦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173)
第二篇 秦汉三国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179)
第五章 陈胜吴广起义和刘邦项羽灭秦	(179)
第六章 楚汉战争	(205)
第七章 西汉平息内忧与消除边患的主要战争	(248)
第八章 绿林军摧毁王莽政权的昆阳决战	(314)
第九章 刘秀统一战争	(326)
第十章 黄巾大起义	(359)
第十一章 三国的形成及关键性的战争	(367)
第十二章 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	(438)
第十三章 魏灭蜀和晋平吴	(487)
秦汉三国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513)
第三篇 两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520)
第十四章 羯族石勒统一北方的战争	(520)
第十五章 氐族苻坚统一北方与淝水之战	(544)
第十六章 刘裕“北伐”	(568)
第十七章 鲜卑拓跋焘统一北方和宋魏战争	(591)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616)

第一篇 先秦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最早的战争是部落之间为争取生存或血缘复仇而进行的暴力行动。这是战争的萌芽，在性质、意义上与阶级社会的战争不同，但阶级社会一切类型的战争，都是原始社会战争的发展。

先秦古籍根据传说记载的最早一次战争是神农伐斧鬻之战。继后的主要战争，有炎帝与蚩尤榆罔之战，炎帝、黄帝联盟与蚩尤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阪泉之战，黄帝后人颡项与炎帝后人共工之战，尧与驩兜丹水之战以及舜、禹对三苗之战等。这些战争的结果，加速了原始公社的瓦解过程，导致部落联盟的基础——血缘亲属关系的破坏和走向部落融合的阶段。禹战胜三苗后，在涂山召开上万名部落首领参加的大会。^{〔1〕}这反映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中心、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氏族的大联合，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时，仍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当进攻别的部落，掠夺人、财时，或遭到其他部落袭击、劫掠而需要自卫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要召开部落联盟首领会议，取得各部落首领同意后，由最高军事首领执行。军事首领的作战指挥，十分简单，而且主要表现在战斗开始前的组织和战斗结束后的处理上，在战斗进程中则难以体现。作战方式和方法也很简单，当时还没有军队和专门的战斗武器，作战时是全体部落能战斗的成员或部分志愿人员参加，用生产工具进行搏斗，在军事首领率领下，不论人数多寡，皆各自为战，全凭体力和勇敢决定战争胜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谈不到战争指导艺术，更无战略可言。只有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由于战争频繁和规模增大，战略及战

爭指导艺术才逐渐得到发展。

注 释

〔1〕《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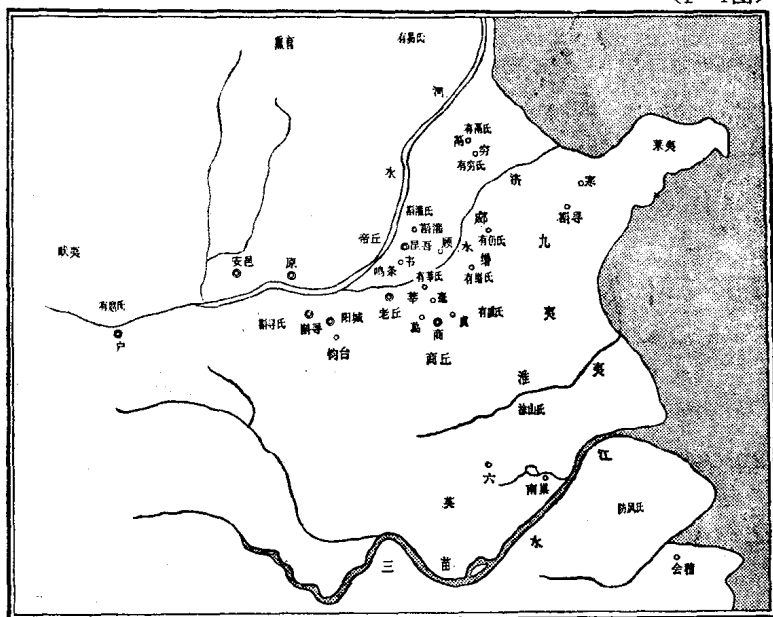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商汤灭夏

第一 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军事概况

夏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

(公元前二十一至公元前十七世纪)

(1—1图)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七世纪，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左右。以中国原始社会最后一个由民主推举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大禹的传子为标志，结束了原始公社制度，而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独占部落联盟首

领职位。禹虽然不得不顺应传统习惯势力推荐伯益，但禹的儿子启已掌握了许多权力。禹死后，启就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禹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王。

启建立夏王朝后，东方偃姓部落的伯益带领东夷的军队，首先起来反对夏启，经过激烈的战斗，启把伯益杀掉。^[1]

反抗的势力不仅来自外部的东夷，也来自夏部落内部。在夏族西方的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夏启。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要“恭行天之罚”，要“剿绝其命”^[2]。双方大战于甘（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有扈氏终于被“剿绝”了。

夏启对有扈氏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夏王朝终于站住了脚跟。夏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大会诸侯，举行宴会，诸侯纷纷前来朝贺。夏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诸侯（旧日部落新贵）的正式承认^[3]。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由于他们的奢侈淫乐，人民不堪忍受其剥削与压迫，起而反抗。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利用这一机会，出兵赶走太康，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4]。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以后，他的弟弟仲康之子相投奔姒姓部落的斟灌氏和斟寻氏。这时，寒浞又取代“不修民事”、沉溺于田猎游乐的后羿的王位，用兵灭掉斟灌和斟寻，杀死了相。

相的遗腹子少康在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县）的帮助下，“有田一成”（方十里的土地），“有众一旅”（五百人），积极招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的准备。原夏臣伯靡在鬲（今山东德州），也收罗二斟的残余势力，与少康相互配合。最后，终于攻灭寒浞，由少康称帝，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5]。史称“少康中兴”。

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是充满着新与旧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王位世袭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夏王朝因为拥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才得以恢复和巩固它的统治。

当时，生产力已较原始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了一些剩余产品，有了冶炼青铜等与战争有关的手工业，有了专门用于战争的兵

器，所以在经济上也就有了建立军队的条件。

夏启在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中要求“六事之人”坚决执行他的命令。“六事之人”就是军事长官，他们既管军队，也管政事。夏朝的主要兵种仍然是步兵，但已有少量的兵车参加作战^[6]。

指挥系统是由国王亲自统率本族成员组成的王室军和一些近亲家族成员组成的贵族军。军队的组织尚未形成固定的编制，各支军队的人数也不一样。但已有了最初的军队纪律——赏罚，并和以祖庙和神社的神主为中心的原始宗教相结合。如《尚书·甘誓》上说夏启对六军的将领宣布：“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7]

到夏代中期，夏武帝杼以坚甲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军队，战胜了以强弓硬箭装备的东夷军队，一直打到东海。这说明帝杼时已能制造兵甲^[8]，军事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夏王朝奴隶主贵族为了防止奴隶阶级和平民的反抗以及外族的侵掠，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还修建了“城郭沟池以为固”。这种设防城市的出现，就是文明时代——国家出现的又一重要标志^[9]。

少康中兴，十一传至夏桀。夏桀（履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暴君。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0]他为了制服叛离的诸侯，以武力威逼东方的许多邦国，在仍（今山东济宁东南）举行朝会，结果反而激起了有缙氏（在今山东金乡东北）等更多诸侯的叛乱。夏桀出兵征讨有缙，有缙虽然战败了，但夏王朝也为之元气大伤，加速了它的灭亡^[11]。

就在夏王朝阶级矛盾和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黄河下游的一个商人部落，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兴起来了。

第二 商族的兴起和灭夏的准备

商人的祖先居住在孟诸泽畔的商丘^[12]，不断开拓这一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薮泽地带，逐渐发展起来，并向着黄河中游扩张其势力，从夏王朝的属国变为夏王朝东方的强大对手。

商部落的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世本》说相土时已学会“乘马”,《吕氏春秋》说到王亥时又掌握“服牛”的技术。《管子·轻重戊篇》也说:“殷人之王、立帛(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13〕这说明夏代中期,商人已驯服牛马,用于交通和生产,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

畜牧业比较发达的部落,武力都比较强盛。在相土当部落首领的时候,乘夏王朝太康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的机会,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商汤继任商部落首领时,曾被夏桀召去囚于夏台(今河南禹县),但不久又释放了他〔14〕。

在夏桀的残暴统治下,夏王朝内外矛盾都极尖锐,不仅畿内人民纷起反抗,周边方国也纷纷叛离。夏王朝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商汤针对这种形势,利用夏民痛恨夏桀的心理,积极展开灭夏的准备工作。

商汤任用贤人伊尹为相。伊尹为有莘氏(在今河南陈留东北)媵臣,有莘氏嫁女,他是陪嫁的一名奴隶,他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汤游说,受到汤的赏识,从而得以向汤进灭夏建国大计。汤派伊尹两次去夏,了解夏朝情况,进行活动,以改变夏桀对成汤的嫌隙,并从而进行“内间”工作。伊尹回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后,夏朝内部君臣离心更甚,关龙逢被杀,费昌叛桀投汤。伊尹与夏人仲虺(huī毀)被汤任命为“尹”,成为最高执政大臣〔15〕。

伊尹经常与商汤议论过去一些国王施政的优劣得失〔16〕,以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借鉴,认识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道理〔17〕,注意对内“修德”,顺应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之心。在战前奖励生产,轻刑薄敛,以缓和阶级矛盾,获得人民的支持。并与有莘氏和曾为夏车正的薛族(在今山东薛城附近)结为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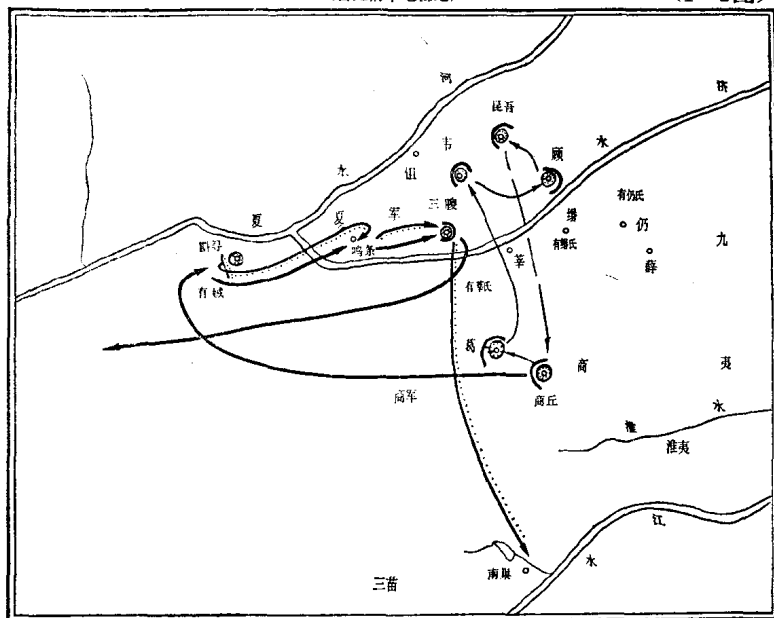
从以后灭夏战争的实践过程来看,商汤采取的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翦除夏桀羽翼,削弱孤立敌人,然后进行决战以取而代之的战略。在伊尹、仲虺等人大力辅佐下,做好了准备工作,便对夏桀发起了攻势。

第三 鸣条之战作战经过

商夏鸣条之战示意图

(公元前十七世纪)

(1—2图)



鸣条之战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

商汤伐夏桀是从灭葛开始的。葛(在今河南宁陵北)是夏朝的最亲近的属国,在商都亳地附近。汤要灭夏必须先拔掉这颗钉子。葛伯的放纵无道,给商汤提供了进攻的机会。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便以助祭为名送牲畜给葛,又派人前去助耕。葛伯杀死了送饭的儿童,商汤以此为借口,出兵灭掉葛国,取得攻夏的第一个胜利。〔18〕

汤灭葛后,进一步展开了翦除夏桀羽翼的大规模行动,进攻夏朝的三个重要属国——韦、顾和昆吾。《诗经·商颂·长发》有描写这场战争的威武场面。

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濒于大河东岸;顾(在今山东野

城东北)在济水中游;昆吾在洧水之西(今河南许昌东),号为“夏伯”。这三个分据在大平原中部的大方国与夏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夏桀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屏障。商汤集中兵力分别击灭了这三个方国,翦除了夏王朝的羽翼,全部占领了兖、豫大平原,夏桀便势孤力薄,处于正面受敌的不利地位。

商汤击灭韦、顾、昆吾以后,与夏桀决战的条件渐趋成熟。尽管如此,汤仍然按照伊尹的谋划,先用停止对夏朝纳贡的办法,以窥察夏桀的实力。果然,夏桀大怒,下令“起九夷之师”夹攻商汤。汤见九夷(在今淮河流域)还听夏桀的指挥,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不宜进行决战,便谢罪请服,又恢复对夏朝的纳贡,同时加紧准备力量,以便寻机决战。^[19]

次年,汤再次停止对夏朝的纳贡。夏桀又召集邦国诸侯在仍(今山东济宁东南)会盟,有缙氏(今山东金乡东北)带头叛夏^[20]。汤和伊尹见“九夷之师不起”,^[21]夏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立即号召各邦国诸侯,兴兵伐桀。

汤在战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誓师词,他谴责夏桀破坏生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以致人们宁愿跟桀同归于尽。汤说,夏桀有罪,上天命令我消灭他,我害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桀。汤还申明,你们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桀,我会赏赐你们,我决不食言;如果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惩罚你们作奴隶,把你们杀掉,决不宽恕。^[22]

商汤誓师后,简选“良车”七十辆,“必死”六千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地进攻当时的夏都斟寻^[23](今河南巩县西南)。桀率夏军仓促出战于有娥之墟,战败东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商汤挥军追击。

夏桀收集夏军,与商军大战于鸣条,商军大胜,夏桀军再败而走依三隈(在今山东定陶东)。商汤趁势攻灭夏朝的属国三隈,掠取了当地的宝玉。桀仅率少数残部南逃南巢氏(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夏亡。

商汤又挥军西上,攻取了夏朝的腹心地区。汤灭夏后,回师西亳

(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24〕}大会，得到三千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共主的地位。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正式建立了。

商汤建国后，又向四方征伐，统治地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商周边部落前来朝贡的越来越多，加速了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 商夏鸣条之战的战略研究

公元前十七世纪，商夏鸣条之战，是中国奴隶社会中最早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战争。从战争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战争的规模扩大了。商汤的战争指导，已从单纯的军事斗争向军事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战略的运用主要表现有如下各点：

一、商汤已初步认识到“视民知治不”的道理，即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负

“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商汤说：“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25〕}商汤把人民是否拥护国王，作为衡量国家治乱兴亡的尺度。夏桀时，“百姓弗堪”。汤从此看出夏王朝败亡的不可避免，并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情况，顺应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之心，内修“德政”。在战前，奖励生产，轻刑薄敛，以缓和阶级矛盾；在战时以“今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获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外结诸侯，争取与国，出现了“诸侯皆归汤”的政治局面。所以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26〕}因此，商汤的军队所向披靡，“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这种认识和措施，就为覆灭夏王朝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夏、商奴隶主的统治思想是把“天”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敬事

鬼神；而商汤多少能看到一点人民的力量，这比简单的“天命”观当然是进了一步。

二、商汤伐夏桀前，创造性地运用了“用间”的谋略，起到了充分了解敌情和分裂、削弱夏王朝的作用

“伊尹去汤适夏”，就是进行“五间”。〔27〕他探知了夏王朝的情况，分裂了夏王朝内部的团结，离间了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夏王朝的力量，为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可靠的条件。

《孙子·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又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明确指出“用间”的重要意义和只有“用间”才能得到“先知”。

《孙子·用间篇》最后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明确地把汤用伊尹列入“用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用间”的典型范例。这在夏、商时期统治者尊奉“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中，在对待战争问题上能带有朴素地唯物主义反映论特点的思想因素，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商汤采取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羽翼，然后进行决战的战略方针，故能以弱胜强

商族原是夏的弱小属国，居黄河中下游。商汤时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王朝力量相比，仍处于劣势，不宜与夏朝正面冲突。于是汤采取先伐葛、韦、顾、昆吾四方国，以翦除夏桀羽翼。在掠夺四方国封疆、实力大增、基本上改变了夏强商弱的形势之后，方大举伐桀。这种战略步骤的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葛和韦、顾、昆吾都是夏的属国。尤以昆吾号称“夏伯”，是夏桀最亲近的依靠力量和他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葛在商都亳地附近，力量较昆吾弱。汤在伐桀之前，先兴师灭葛，继而集中兵力逐次灭亡韦、顾，再攻灭实力较强的昆吾，摧毁了夏桀的支柱和屏障。此后，